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理论创新

朱小玲 胡 倩*

〔摘 要〕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也是党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在党的群众路线的创立、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延安时期无疑是最为关键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对群众路线作出新的理论概括,第一次系统地、完整地阐述了党的群众观点,提出并系统地阐发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方法,而且对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群众路线与思想路线的关系进行了新阐释,并将群众路线提升为党的根本路线,列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载入党章。认真研究延安时期党对群众路线的理论创新,对于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 延安;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理论创新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具独创性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软实力。延安时期是我们党群众路线理论创新的重要时期,其主要标志是形成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路线和一整套相关理论。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理论创新的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13年,是群众路线理论不断创新发展的13年。群众路线理论之所以在这个时期不断创新,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一) 中国共产党的生存与发展面临十分严峻的历史考验

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农村,在农村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为了消灭共产党,国民党对各革命根据地进行了一次比一次规模更大的军事“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此时,中共中央直接率领的红军队伍只剩下七千人,成了“皮包骨”。在内有国民

* 朱小玲,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10023;胡倩,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210023。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14YJA710043)阶段性成果;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

党的军事围剿、外有日本侵略的民族危机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历史考验。要想打开局面走出困境,使延安成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落脚点”和中国革命新的“出发点”,唯一的选择就是取信于民,获得群众的支持。正如毛泽东所说:“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要民众,虽危险也有出路;不要民众,一切必然是漆黑一团。”^①但当时中国共产党在争取群众支持方面还面临着许多困难。一方面是因为之前由于“左”右倾错误的影响,党的群众工作中存在着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领导方式,超越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每每没有能够与土地革命、与群众的当前实际生活实际问题,紧密的联系起来,不善于依据群众的阶级觉悟程度和分别对象去进行宣传工作,”^②影响了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国民党的歪曲宣传和造谣欺骗,导致普通群众对党和红军不了解和不信任,加上由于共产党力量弱小,人民群众害怕接近共产党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和军阀的报复迫害。因此,党中央刚刚达到陕北时,许多群众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都是敬而远之,走路不愿意一起走,躲空袭不愿在一个防空洞。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必须在总结群众工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充分阐明群众工作的重要性和如何在实践中为了群众、依靠群众、取信于民。

（二）抗日战争的实践需要先进的理论指导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前后,中国正处于政治大变动前夜。一方面是日本侵略者利用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步步进逼,在发动“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后,又在特别是1937年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事变,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眼前。另一方面,在日本要灭亡中国的形势下,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但面对日本强敌的入侵,特别是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节节败退,中国的一切阶级和政治派别都不能回答抗日战争究竟将怎样发展?中国能否取得抗战胜利?如何才能取得胜利这些关键问题。因此,组织发动广大民众参加抗战,使这场战争真正成为全民族的抗战并取得胜利,成为党的中心工作,因为“群众是我们的最后依靠,也是抗战的最后依靠。”^③抗日战争的实践需要先进的理论指导,而从理论上说明抗日战争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实现对人民群众的领导以及在抗日战争的实践中如何依靠群众、组织群众等问题,成为推动中国共产党不断创新的伟大动力。

（三）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理论上趋于成熟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上成熟、理论上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首先,中国共产党成立有了20年时间,中间经历了由北伐战争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和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兴起的两次历史转折。丰富的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丰富的材料,使党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包括群众路线有了新的正确认识;其次,形成了第一代领导核心,确立了正确的政治、思想、组织路线。中国革命的历史是大浪淘沙,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领导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1938年共产国际“七大”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看法,承认了毛泽东在全党的应有地位。1938年9月至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巩固和确认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经过延安整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正式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稳定成熟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中国共产党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

^①《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2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4页。

论创造奠定了基础;再次,中国共产党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有条件认真学习理论,总结经验。鉴于中国革命的实践需要和党内理论水平不高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号召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前后,毛泽东投入极大的精力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撰写了一大批理论著作,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理论进行了创造性发挥。延安整风期间,全党上下进行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理论水平得到明显提高,为敢于创新和善于创新提供了可能。

二、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理论创新的具体体现

(一) 对群众路线作了新概括

中国共产党人从创立之日起就已经把群众路线看作在革命活动中应当经常和普遍遵循的准则。1928年11月,李立三首先提出了“群众路线”这一概念,他指出,“在总的群众路线之下,需要竭最大的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①。1929年9月,在《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周恩来也明确使用了“群众路线”的概念,并强调了在党的各项工作中要“经过群众路线”。其后,毛泽东在许多关于经济工作的文章中对群众路线作了初步的概括。但由于历史原因,当时没有来得及对群众路线从理论上做出系统的概括。延安时期,随着党和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以及党对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加重,正确处理党群关系,认真总结群众工作的经验越来越提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上;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的形成与政治上理论上的逐步成熟,群众路线的思想也进一步完善起来,具备了从理论上对群众路线进行新的概括的条件。1942年4月,毛泽东指出:“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②。毛泽东这里所说的“人民的路线”,实际上就是群众路线。1945年5月,刘少奇在《论党》中对群众路线做了进一步概括,指出“所谓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党的群众路线”^③,并强调群众路线就是要在工作中把最高的原则性和与群众最大限度的联系相配合。

(二) 对群众路线的内容进行了新发展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丰富、发展了群众路线的内容,使党的群众路线具备了成熟的理论形态。

1. 第一次对群众观点作了系统完整的阐述。自觉贯彻群众路线的基本前提是群众观点的确立,而第一次系统地、完整地阐述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观点是在延安时期。1938年10月,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决不可脱离群众的多数,置多数人的情况于不顾,而率领少数先进队伍单独冒进;必须注意组织先进分子和广大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这就是照顾多数的观点。”^④1943年5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边区群众工作的指示》专门提出了群众观点:“关于群众观点的问题。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专为群众谋利益的,除开了群众的利益没有别的利益。同时共产党也只有依靠群众,才能生存;没有广大群众的拥护,共产党是很难生存的。”^⑤上述这些论述,从不同的角度对群众观点进行了阐释,而集中全党智慧,第一次对党的群众观点进行了系统完整阐述的是刘少奇。他在《论党》中指出:“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

^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65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9页。

^③《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47—348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25—526页。

^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43.1—1943.12)》第20册,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06—307页。

群众学习的观点,这一切,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就是人民群众的先进部队对人民群众的观点。”^①1947年9月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中进一步强调群众观点是革命观点、革命精神,没有群众观点,就没有群众路线。

2. 提出并系统地阐发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方法

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既包括群众观点,又包括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价值导向的具体体现,而要使这一价值取向能够得到更好的贯彻和落实,还要有具体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风等方面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因此,能否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检验党的工作内容、工作方法及工作成果的根本标准。1939年5月30日陈云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中要求每个共产党员要随时随地在实际工作中向群众学习,将实际工作中和群众斗争中的经验教训作为最好的学习课本。这些论述都包含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方法,而系统论述群众路线根本方法的则是毛泽东。1943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明确指出:在运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这些原则时,必须注意领导方法,而“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根本方法的提出和系统阐发,表明党对群众路线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3. 民主集中制是群众路线在党内生活中的应用

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它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群众路线在党内生活中的运用。中国共产党能否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实行状况。在总结领导工作一般规律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将党内民主集中制与群众路线联系起来,指出“党内民主的集中制,即是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党员群众相结合的制度,即是从党员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党员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制度,即是反映党内的群众路线。”^③把民主集中制归结为党内群众路线,强调民主集中制是群众路线在党内生活中的应用,是群众路线在组织建设上的反映,这不仅是党对民主集中制认识的一次深化,更是对群众路线涵义的丰富和发展。

(三) 对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了新思考

坚持群众路线,并非取消党的领导,而是要正确处理好党群关系。理顺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关系,是贯彻群众路线的基本前提。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群众路线内容新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

首先,强调了党和群众密切联系的重要性。刘少奇在《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一文中指出:“正确建立党和群众的关系,是我们党同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的重要工作之一。”^④1941年任弼时在《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中指出:“我们党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与广大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就在于它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⑤,并将能否与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作为测量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志。其次,确定了党与群众正确关系的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是群众中的一部分,因此,它必须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同群众生活在一起,处处依靠群众;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中国人民的先锋队,是群众中先进的、觉悟的、马列主义的、有组织的一部分,因此必须保持它的特性,不能溶于群众的大海,而应

^①《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5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00页。

^③《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59页。

^④《刘少奇选集》(上卷),第60页。

^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41.1—1941.12)》第18册,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810页。

该成为群众的政治领袖。这一特性决定了建立党与群众正确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同群众在一起,而又领导群众;是群众的学生,而又又是群众的政治领袖”。^①再次,形成了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一是在领导群众斗争中,要从群众的实际出发,满足他们切身的、局部的利益,任何时候不要提出过早的、群众还没有了解的口号。二是“在群众前面,而又不脱离群众;等待群众,而又不做群众的尾巴。”^②三是努力向群众学习,并且在学习中更好的领导群众。四是不能“在组织上直接要求群众服从党的指挥,要求群众团体接受党的命令,而是要使群众自愿地接受党的政治主张。”^③党与人民群众关系的新认识,赋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特殊内涵,有效改善了我们党的政治生态。

(四) 对群众路线与思想路线的关系进行了新阐释

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群众路线和思想路线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两者有着内在一致性。

1. 群众路线是思想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体现。认识来源于实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而这种实践主要是人民群众的实践。党的思想路线之所以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正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将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和来源,并将从实践中获得的理论指导实践。而群众路线的“从群众中来”,就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将分散在群众中的不系统的观点、意见,转化成集中的、系统的观点和意见,实际上就是在群众实践的基础上将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过程,这与“认识来源于实践”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到群众中去”,也就是将集中起来的正确的群众意见,进一步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并通过实践来检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④刘少奇在《论党》中也指出:只有“虚心地向人民群众学习,把群众的知识和经验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更高的知识,才能够具体地去启发群众的自觉,指导群众的行动。”^⑤“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思想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体现。

2. 思想路线要在群众路线中贯彻执行。1941年,毛泽东为《农村调查》写了第二个序言,在这篇序言中,毛泽东对调查研究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指出“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⑥而“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⑦这里所说的“向社会作调查”,也就是要求共产党深入群众,向广大群众了解实际情况,体现的是群众路线中的“从群众中来”。从这些阐述可以看出,调查研究是实事求是的根本途径,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关键环节。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3. 群众路线是检验思想路线的标准。党的思想路线强调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而这个实践正是群众实践。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实践的直接参与者和直接感受者,群众对于检验真理正确与否最有发言权。“到群众中去”,也就是强调以人民群众的实践作为真理的检验标准。毛泽

①《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39.1—1939.12)》第16册,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50页。

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39.1—1939.12)》第16册,第751页。

③《刘少奇选集》(上卷),第59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3页。

⑤《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53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1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89页。

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判断领导意见的正确与否，必须在“群众行动中考验。”^①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又指出必须由群众来检验我们任何一项政策的正确性。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进一步强调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由此可见，要“在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时，切切实实解决人民群众所关注的切身利益和实际问题”^②，实践检验的标准就是群众检验的标准。

（五）对群众路线的地位进行了新提升

1.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路线是政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准则，它包括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中国共产党的路线从根本上说是为了人民群众，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路线就是群众路线。1945年5月，刘少奇在《论党》中指出：“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在一切工作中必须有彻底的明确的联系群众的路线。”因为“我们党的及我们党所领导的各种工作、各种事业，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并都是（无一项不是）经过人民群众去进行的工作，都应该有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去进行。”^③所以，“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离开群众路线，党的政治、组织、军事及其他一切就不可能有正确路线。”^④

党的组织路线是为了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在组织工作中所实现的路线，党的一切组织与一切工作必须密切地与群众相结合。1945年4月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应该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为使这个路线真正从群众中来，特别是真正能到群众中去，就不但需要党和党外群众（阶级和人民）有密切的联系，而且首先需要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内群众（干部和党员）有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需要正确的组织路线。”^⑤刘少奇在《论党》中进一步指出：“不但我们党的政治路线，而且我们党的组织路线，都应该是正确地、从群众中来的路线，又正确地到群众中去的路线。”^⑥

经过延安整风，全党对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的认识更加深刻。刘少奇在中共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群众路线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强调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并将群众路线的基本精神和内容写入党章，这是马克思主义群众理论中国化的集中体现。

2. 将群众路线列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实际工作的经验总结，也是在党的作风建设中不断完善、发展的。1943年10月，毛泽东在《切实执行十大政策》中指出：“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⑦刘少奇也强调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才具有的，群众观点及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是和一切剥削阶级对待人民群众的观点及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根本不同的。经过延安整风，全党对作风建设与群众路线的关系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党的“三大作风”，并将密切联系群众作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将群众路线列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并强调这是中国共产党与其他任何政党相区别的显著标志，是对群众路线地位的又一个新认识。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9页。

②郭文亮：《一党长期执政条件下怎样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理论探讨》2014年第1期。

③《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54—355页。

④《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92页。

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46.1—1946.12）》第22册，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00页。

⑥《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48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71页。

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理论创新的重要贡献

(一) 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群众理论的中国化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理论创新的过程,是把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中国化过程。

1. 对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主体价值观和历史观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①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②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主体价值观和历史观。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和历史观的深刻理解和感悟,中国共产党不仅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③而且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④并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作为群众路线的核心,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主体价值观和历史观的继承和发展。

2.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实践中的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指出,实践不仅是认识的来源与动力,也是认识的目的与归宿,因为认识世界本身不是目的,只有改造世界才是认识的最终目的和归宿。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具体转化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科学领导方法。1943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⑤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贯彻群众路线中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创造性运用。

(二) 密切了党群关系,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毛泽东曾经说过,陕北是两个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延安不仅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也是中国革命走向全国胜利的“转折点”。延安之所以有此特殊的历史地位,与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密切相关。美国著名学者马克·赛尔登认为“延安道路”的精髓是群众路线,完全依靠中国人民尤其是农民的创造力是这条路线的特点。延安时期,为了切实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在政治上,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权,积极发展以普选为基础的民主政治,让广大人民群众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在经济上,实行减租减息和土地革命,开展大生产运动,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千方百计让人民群众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在文化上,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发展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文化,广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运动,并致力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给人民群众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4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1095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1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9页。

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因而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认同。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坚信“战争之伟力存在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集中群众智慧,组织群众力量,从而形成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全民族团结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反美反蒋的“第二条战线”,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获得了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最深厚的力量源泉。

(三) 为新时期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从严治党”提供了理论指导

在全党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党的十八大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理论创新,为新时期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从严治党”提供了理论指导。“为民”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第一项内容,是践行群众路线的根本立场,这正是延安时期群众路线的核心内容——“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要求。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让群众满意是我们党做好一切工作的价值取向和根本标准,群众意见是一把最好的尺子。”^①“务实”是践行群众路线的时代精神,强调的是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这正是延安时期群众路线的根本工作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持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统一的具体要求;“清廉”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证,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从严治党、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紧迫任务,也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正确处理党和人民群众关系、加强党风建设的基本要求。随着以反“四风”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入发展,为了进一步践行群众路线,改进作风建设,从严治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重要思想,这“三严三实”的重要论述,既是指明了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干部的为政之道、成事之要、做人准则,又是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理论的继承发展与创新。

(责任编辑:王永贵)

The CPC'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Its Mass Line during Yan'an Period

ZHU Xiao-ling, HU Qian

Abstract: The mass line is not only the fundamental work lin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but its leadership style and work style as well.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mass line, the period when the CPC headquarters was located in Yan'an undoubtedly play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At that time, the CPC achieved a new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mass li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epistemology: for the first time it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d its notion of the mass line and proposed “from the mass and into the mass” as its principal working method. In addition, the CPC redefin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mass and between the mass line and the theoretical line, upgrading the mass line to the fundamental line of the party and listing it among the three fine work styles in the party constitution. Therefore, we have to carefully investigate the CPC's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in its mass line during the Yan'an period, which has a lot of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deepening the current mass line education.

Key words: Yan'an period;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ss lin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①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11页。